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三八期 ——  
(二〇〇八年四月七日报出)

---

本期目录 (zk0804a)

---

【本刊专稿】	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铸	司马清扬·欧阳龙门
【历史回顾】	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	胡学常
【回首文革】	1966年夏北大见闻(上)	李海文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本刊专稿】

### 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铸

·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

#### 一、陶铸“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 彭真被毛泽东打倒, 改组中央书记处势在必行。邓小平揣摩圣意, 推荐陶铸进京, 无疑是符合毛泽东的要求的: 首先, 陶铸同刘少奇一直有些积怨, 在党内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对头”。同时陶铸是个直性子, 爱放炮, 敢放炮, 可以用来炮打“中央的修正主义”,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延安整风时期, 担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被作为“靶子”进行抢救, 受到折磨, 以后是毛泽东伸出以援手得以获救。同时, 在柯庆施被整的事情上, 陶铸仗义执言, 对整人的刘少奇表示不满, 留下积怨。〔1〕

在建国后的“高、饶事件”中, 陶铸曾经配合高岗向刘少奇“开炮”。以后又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出对刘少奇的不满。例如, 当刘少奇已经明确地成为了党的第二把手以后, 陶铸还以曲折的方式表达说: “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 我举双手赞成。”〔2〕

但是有一点，毛泽东当时并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铸与刘少奇的矛盾已经有些缓解。根据陶铸的自述，刘少奇在陶铸承认错误后，宽宏大量，使得陶铸对刘的看法大为改变。进而因为陶铸赞成刘少奇的建国路线方针，陶铸已经成为靠近刘少奇的一位地方大员。（3）1965年1月，陈伯达发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时，告诉了王力，王力建议由陈伯达会同陶铸、彭真去做刘少奇的工作。笔者认为：虽然毛泽东对陶铸向刘“靠近”不会毫无察觉，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陶铸已经成为刘系人马，依然认为陶铸能够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能够担任“炮轰”刘少奇的先锋。

在此，笔者还要着重指出的是：陶铸是精通并善于进行党内斗争的人。（4）正如单世联评论：陶铸在1950年的广西剿匪问题和1952年的广东土改问题上显示出极强的斗争能力。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5）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除了毛泽东的信任支持外，陶铸如果不善于党内斗争，也是不可能胜出，取而代之。陶铸的这种党内斗争经验是获得毛泽东青睐的重要资本。

除了毛泽东的赏识以外，陶铸和邓小平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说：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6）

另外，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是，陶铸还同林彪的关系私交很好。陶铸是可以不敲门通报直接见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肃罗瑞卿之前，林彪曾私下向陶铸交底；（7）1967年元旦前夕，陶铸备受压力，林彪曾特意给陶铸以“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8）

在毛泽东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苗头：分化刘少奇、周恩来，打倒刘少奇之后，周恩来则是下一个被打倒目标。正如陈毅在文革初期一针见血：“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9）

而周恩来对此也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文革伊始，周恩来就在门厅前面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随时被抓走，到时候只需提上这只小包。（10）

作为替代，毛泽东准备安排邓小平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并且兼管中央专案组；启用陶铸接手周恩来的政务系统；林彪则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

林彪与邓小平长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势同“一山不容二虎”，陶铸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因为陶铸和林、邓两个人均有很好的个人关系。

毛泽东从1964年底就开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陶铸就逐渐成为毛泽东的棋盘上一枚重要的棋子。1965年1月，陶铸同谢富治一起被补增为国务院副总理。次年5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取代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并在1966年6月23日出任专为文革成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革小组组长。（11）

陶铸之所以能当上中央宣传部长，和他大力颂扬毛泽东不无关系。自1966年初，陶铸主管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就宣传毛泽东个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方面无疑在几个大区内是首屈一指。仅举二例：

（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南局的《决定》，在该消息上面是通栏大字口号“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所指的“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在这一版上全齐！

（2）5月29日，《羊城晚报》再发表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旗手”。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领袖，需要具有最伟大天才的革命舵手”。（12）

陶铸接管后的中央宣传部，在毛泽东眼里应该不再是“阎王殿”，对于文革的顺利发动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至少陶铸和陆定一相比，毛泽东觉得会顺手很多。在7月中旬，毛泽东曾经派李志绥回到北京，找陶铸了解文革形势。（13）应该说，毛泽东对于陶铸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铸除分管中宣部外，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等，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14）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陶铸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可见毛泽东对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15）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尽管邓小平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和毛泽东有些疏远，而和刘少奇越走越近，以至于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站到了一起，但是毛泽东始终是将刘、邓是分开的。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邓小平的位置比文革发动前提升了。按照王力和陈伯达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陶铸是从下面被毛泽东“勾”上来的，也就是说本来邓小平的排名比后来的高。（16）而邓小平在这次改选中，是全票当选。（17）这足以说明毛泽东还是要用邓小平的，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还分管中联部、中调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邓继续担任“彭、罗、陆、杨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根据王力的回忆，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他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18）

然而，由于林彪所持的与邓小平“势不两立”的态度，由于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采取的“避其锋芒”的态度，又由于邓小平对刘少奇未能“反戈一击”的态度，使毛泽东的这个初衷未能实现。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形势比人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本来是要批刘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却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刘，刘已经被“一张大字报”打倒，现在主要危险是邓。林彪批判邓小平同自己争战功，把邓小平同彭真、吴晗和北京市委问题等捆绑相连，指责邓小平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19）

这并非毛泽东的本意。从邓小平在常委中的排序和分工等迹象看，毛泽东是要留下邓小平的。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因为邓与十帅中的九帅关系都很好，唯独从不与林来往。邓小平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

崩了。”〔20〕可以这么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林彪、邓小平共处为其最重要的布局。但是林彪把邓批成那个样子，两人就无法共事了。邓对康生说，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21〕林彪整邓，破坏了毛泽东的部署，种下毛、林之间的芥蒂之因。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表现也是耐人寻味的。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不仅没有揭发批判刘少奇。反而在检讨中主动把自己同刘少奇相提并论，提出“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22〕

以后，林彪和陈伯达公开将刘、邓并提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陈伯达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就在全各地广泛流传开来。

由于邓小平无法继续工作，刘少奇负责的党务工作只好由周恩来暂时担当。其间林彪也曾短暂地主持过中央工作，但最终还是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党、政两方面的事务。陶铸自然是无法很快接手周恩来这两个摊子的，于是周恩来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则采取了“冷藏”的办法，以备后用。

## 二、陶铸“倒台”的过程

“打倒陶铸”原本不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之中，不仅如此，毛泽东原本还打算重用陶铸。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铸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突不断。陶铸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陶铸已经成了继续深入发动文革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整肃。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更能够让毛泽东和江青所接受。局势的发展、两人各自的表现，终于导致了陶铸的“倒台”和周恩来的“保全”。

上面说过，陶铸在调到中央以后的工作，对于文革初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积极响应并支持的，毛泽东也是满意的，这就有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结果。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开始对陶铸不满。

首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象毛泽东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猛烈开火。从陶铸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由于在“高饶事件”中因为反对过刘少奇而犯错误的教训，所以有些踌躇不前。对此，毛泽东当时虽有不满但尚未计较，仍然重用陶铸。

8月、9月，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来和陶铸两人在管，毛泽东后来表示过对两人这段时间工作的不满。

1966的10月1日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上了天安门。但是到了晚上，毛泽东用坐“敞篷车”的特殊方式告诉世人那些人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陶铸还是坐敞篷车的一员。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被排除在外。〔23〕但是陶铸在宣传上对十一个常委是照章办事，同样对待。所以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铸搞的。〔24〕

不仅如此，当陶铸发现邓小平没有一个靠近毛泽东的镜头时，便把陈毅靠近毛泽东的一张照片换成了邓小平。〔25〕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换头术”，后来也成为陶铸的罪名之一。

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铸的秘书马恩成回忆：“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

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26〕陶铸仍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反对在农村工矿企业深化文革，连续搞了几个社论和指示，所有这些，虽然毛泽东画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认为：毛泽东内心是不满意的，这些同毛泽东的文革思维是背道而驰的。〔27〕

这时毛泽东认为陶铸留在中央已经不合适了，让他和谭震林到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但是谭震林说工作忙，又受到冲击，不能成行。毛泽东就让陶铸自己一个人下去。但是陶铸却赖在中央不走！〔28〕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打倒陶铸。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件事却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

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做出了“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肯定结论。而陶铸的态度则是大相径庭。陶铸就在王洪文率众卧轨的前夕，主持讨论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其目的正如陶铸所说：就是要把他们（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等）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29〕然后是唐平铸告发陶铸“换头术”的问题。

11月27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列举了陶铸七大罪状，指责陶铸实际上仍在执行“刘邓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此报告断言陶铸同毛泽东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对台戏。〔30〕

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的。〔31〕很明显，陶铸不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也不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接着，毛泽东决定要陶铸在12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表态要陶铸检讨，实际上就是批斗。〔32〕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以借过生日为名，实际是向其亲信路线交底。毛泽东明确说道：“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33〕毛泽东所引“咎由自取”是陶铸的原话。对于“不识相”的只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忆到：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这个会于12月底在怀仁堂召开，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就是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伯达发言。〔34〕王力的回忆、和曾志的回忆都说在这次生活会是一边倒地批评陶铸，只有李富春说要不让陶铸回中南算了。王力还回忆了一个细节：毛泽东曾说，希望你们能开个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35〕

12月29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和陶铸谈话，毛泽东再次批评陶铸：“你怎么还不下去？”〔36〕陶铸不明就里，以为毛泽东还在保自己。会见以后，立即将谈话内容通报了周恩来和林彪。

周恩来当即作出了布置，说：“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37〕

林彪则说了“你呀，现在就被动”和“要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38〕

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只是还在考虑打倒的时间和方式。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不知得到什么暗示，“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39〕接见中，陶铸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这支造反队，接见中陈伯达、江青、康生表态，随后“打倒陶铸”的消息传遍全国。〔40〕至此，陶铸在毛泽东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 三、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

陶铸倒台原因，诸如没有象毛泽东预期那样对刘少奇猛烈开火、试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试图重新组织建立书记处制度、“换头术”、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不断发生冲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论述，也可以参阅拙作《陶铸之死内幕》。〔41〕

这里我们要列举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歪曲。

陶铸之所以被打倒，第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毛泽东。而不是像中共官方说的“林彪、江青一伙”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陶铸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42〕

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就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43〕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陶铸不老实？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陶铸拜师吹邓的话语。陶铸拜邓为师，其中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在高岗事件中邓是告密者，二是陶铸知道邓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自然认为陶铸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实”，进而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派”。

江青、陈伯达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当林彪、周恩来、以及陶铸本人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打倒陶铸的底牌。当毛泽东还在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来打倒陶铸的时候，他们抢先把这一决定公之于众。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44〕此番话并不能看作是毛泽东不同意打倒陶铸，只是因为“中央有一些老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式的”〔45〕此番话只是批评他们“打倒”的方式不对。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46〕这种评论是一针见血。

林彪在陶铸被打倒一事之中，处于一种中性的位置。由于陶铸的位置所在，其命运并不是林彪所能决定的。所以尽管两人以往的关系很好，林彪没有、也不可能对陶铸加以保护。同时

林彪也没有参与打倒陶铸。在陶铸告诉林彪，说毛泽东仍然要保自己之后，林彪才忠告陶铸要“被动”。〔47〕这个忠告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而只是因为在考虑以什么方式来“打倒”。

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铸的时候，周恩来、王力也在场。〔48〕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糊，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49〕

周恩来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50〕

在此之前的12月6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恩来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51〕事实上，周恩来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铸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52〕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让陶铸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泽东否定了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泽东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恩来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了谷牧之外，还有周恩来和陶铸是涉案人员。在这次会议上，陶铸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恩来在此事上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53〕

在1月4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恩来自己对陶铸说他自己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恩来是在现场。〔54〕且无论周恩来听到与否，周恩来则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中央同陶铸谈话。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恩来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55〕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恩来在5号的谈话，说明周恩来同陶铸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56〕

#### 四、陶铸“倒台”以后

陶铸被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迅速地向纵深发展：造反的浪潮从文教单位发展到工厂农村，以至于军队，各级党政机关纷纷被夺权，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从“路线错误”上升到敌我矛盾。

陶铸被打倒以后，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使周恩来的作用更加无人可替。陶铸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诸如将运动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不让运动进入工厂农村等这些都和周恩来的想法一致，但是这些帐都算到了陶铸头上。陶铸实际上给周恩来作了“挡箭牌”，让周恩来有机会改弦更张，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陶铸被打倒以后，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一决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太多。但是，他当时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57〕以后

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陶铸的问题却一再升级。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58〕，公开点了陶铸的名，指陶铸为叛徒，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铸头上。毛泽东认为该文“极好”，两次为该文加批语，并且拟定文章的标题。〔59〕

事实上，陶铸对于“怀疑一切”既有过模棱两可之中隐藏的不同意，也有过明确的支持。在陶铸倒台以后，这笔帐完全算到了他的头上。而在陶铸平反以后，一些歌颂他的人又完全否认陶铸支持过“怀疑一切”。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陶铸与“怀疑一切”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问题，此处限于篇幅，不做深入阐述。我们准备另文讨论。

1968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60〕

1969年11月，陶铸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后，老干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复职、落实政策，但是始终没有陶铸。

1973年，在给陶铸的妻子曾志落实政策的时候，有人问及曾志的问题，毛泽东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在否定曾志有问题的同时，仍然肯定陶铸有问题。〔61〕

直到1976年3月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江青还在十二个省区座谈会上说：“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62〕江青的这个讲话毛泽东是知道并且作过批示的。〔63〕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江青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说法。〔64〕所以我们说：“打倒陶铸”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

## 五、结论

陶铸的“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图在于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但在林彪的压力下，邓小平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铸代替周恩来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后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泽东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

当毛泽东已经对陶铸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铸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陶铸的决定。在毛泽东尚未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打倒陶铸之前，江青、陈伯达抢先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世。

陶铸倒台使周恩来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

陶铸倒台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

参考文献：

〔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



- 000)第308—309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9页
- (2)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1页
- (3)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52页
- (4)单世联:《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选自《单世联文集》
- (5)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第123页
- (6)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 (7)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第10, 175, 179, 209页
- (8)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4—216页
- (9)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255页
- (10)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第281页
- (1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第6卷,第68页
- (12)余汝信:《短暂的蜜月:1966年毛、林关系的几个问题》 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 2007)第271页
- (13)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第448, 451页
- (14)焕然:《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载《湘潮》2004年,第5期
- (15)阎长贵:《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_\_的》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1期
- (16)详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17页;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2005)第28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46页
- (17)王年一:《王年一手稿(文革漫谈)》 载“林彪网站”(www.linbiao.org)
- (18)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第501—508页
- (1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第501—508页
-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19—621页
- (20)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7页
- (21)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21页
- (22)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1966年10月23日
- (2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22—623页
- (24)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710页
- (2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51页
- (26)马恩成:《陶铸在1966》载《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 (27)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68页
- (28)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0页; 焕然:《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载《湘潮》2004年第5期
- (29)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第669页
- (30)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第669页; 马齐彬:《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第208页

-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第163—166页
- (32)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0页
- (33)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59页
- (34)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3页
- (35)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8页
- (36)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44页
- (37)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38)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第214—216页
- (39)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5页
- (40)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7页
- (41)袁笠翁:《陶铸之死内幕》见“林彪网站” [www.linbiao.org](http://www.linbiao.org)
- (4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115页
- (43)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1967年1月8日 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44)逢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
- (45)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2005)第326页
- (46)王年一《文革漫谈》存哈佛手稿,另见于“林彪网站” [www.linbiao.org](http://www.linbiao.org)
- (47)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第214—216页
- (48)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1967年1月4日 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49)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7页
- (50)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8页
- (51)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5页
- (52)陶铸倒台之前有:1966年10月22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1966年11月17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记要》等等;陶铸到台之后的有: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等等,均载于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私下的讲话参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2005)第324页
- (5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
- (5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48页;传单见于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55)代表中央同被迫害官员谈话宣布中央处理决定是周恩来的一贯职责:无论是早期的习仲勋,杨尚昆还是后来的刘少奇陶铸贺龙都是由周恩来出面向他们宣布中央的意见。
- (56)《周恩来接见揪陶铸的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1967年1月5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57)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 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第277页
- (58)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 (59)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几段批语》1967年8月20日,28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60)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年10月13日 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6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502页
- 〔62〕江青：《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3月2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63〕毛泽东：《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1976年3月10日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64〕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1976年10月1日 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历史回顾】

### 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

• 胡学常 •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兴翻旧账。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就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旧账，专拣那些“文物级”的报刊翻。翻着翻着，一大叠1936年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欣喜若狂。翻到灰头土脸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第2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 ◇ 高仰云反共启事

仰云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高仰云

这个高仰云是南开大学前任党委书记。高书记的“反共启事”，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找到了“宝贝”：平时张口闭口都是革命词藻的高书记，竟然躲在历史的深处反共。这震得南开红卫兵目瞪口呆，欣喜之中一股革命的义愤油然而生，他们直觉得自己的革命热血一个劲儿地往上涌。

红卫兵继续翻检《华北日报》。“反共启事”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人单干，有时多人合伙，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总共9批，不多不少，61人。

#### ◇ 六十一人出狱是执行中央的决定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突然间建起了一座监狱。监狱由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监”和“北监”，有狭小牢房20间，关人规模为100人。这明明是监狱的东西却不叫“监狱”，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企图运用“软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酝酿着大转折的春天，胡服一路风尘，跋涉三月有余，正是为了顺应并促成这个大转折的到来。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甚至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也都在秘密进行。白区的地下工作，过去是关起门来干，或者打开大门，冲向大街，赤膊上阵地干。胡服说，不行，再也不能那样干！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发出的声音，主要就是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这批人的处境，在这个春天固然出现了新的转机，却也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如果华北沦陷，他们就会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们被转至南京，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甚至狱方为甩掉“包袱”，随时都有可能杀害他们。

以胡服为首的北方局，越来越为这批人的处境担忧。与此同时，胡服还发现，在新的正在转好的形势下，许多方面都可以大干一场了，他却找不到更多的干部。后来的“柯老”柯庆施，当时的“柯敬史”，在胡服手下当组织部长。他也觉得应该解决“草岚子问题”了，就向胡服建议，可让草岚子里的人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程序出狱。胡服一听，觉得建议不错，立即写了报告，请示陕北中央。当时的陕北中央，经过商议，很快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1936年6月，一封转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经过秘密渠道送至狱中。信的大意是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按手印登报出狱），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经慎重研究，怀疑是狱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绝执行。过了不久，第二封信又来了，仍然是催促狱中人尽快履行程序出狱，信中郑重写道：“上次写给你们们的信，你们知道是谁让写的么？就是中央代表胡服同志让写的。”还警告说：“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收到第二封信后，狱中党支部又设法向狱外打探虚实，狱外反馈的信息，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狱中人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的决定，同意履行程序出狱。从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人分作9批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共启事”，陆续走出草岚子。

61人的出狱，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事情本来就是一清二楚，61人是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执行刘少奇的决定。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救出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6年61人出狱事件，弄出了很大动静，除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党内许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又据于光远和曾彦修回忆，1947年，康生率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区，帮助当地搞土改。第二年春节，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一行吃饭。饭后，康生与于光远、曾彦修等工作团成员漫步闲谈。闲谈中，康生从刘格平曾蹲过草岚子监狱谈起，说到薄一波等人出狱的事。康生说，薄一波等人履行程序出狱，是中央的决定。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手续，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多坐了8年牢。康生大约是想说，刘格平这个人很怪，傻乎乎地吃了不该吃的苦。

#### ◇ 为翻历史旧账，红卫兵寻找突破口

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翻这笔历史旧账，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八九月间。按照红卫兵自己的说法，他们发现“刘少奇大叛徒集团”，是从搞高仰云开始的。

高仰云早已于两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此时正在南开大学的家中休养，他的夫人李琛还在南开大学工作。校园里打“黑帮”的邪火已经烧起来，很快烧到了李琛，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高仰云自然不干了，说：“搞李琛是给我高仰云脸上抹黑”。又说：“李琛不是反革命，这是政治陷害！”高仰云认定搞李琛乃是现任党委书记臧某某的主意，因而与臧之间的

矛盾日趋激化。当时《新南开》报记者描述说：“一时间，冷落的高家大院成了闹市。休养在家的 高仰云成了南开园里的忙人，接待来访、座谈、游说、讲演、‘扎根串联’”，而且“随着高臧之间的斗争的激化，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武斗逐步升级，流血事件接踵出现”。

邪火就这样轻易地烧到了高仰云。据说南开红卫兵彼时的思想很困惑，“高臧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仰云“又是何许人”？据说还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多少个不眠之夜，八一八小将围坐在一起，捧着红彤彤的宝书，讨论，冥思苦想，寻求答案。”答案出来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大搞社会调查，揭开高仰云的历史，进而揭开南开大学阶级斗争的大盖子。

显然是有人向红卫兵透露了一丝线索：高仰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极深，杨在牢中曾经给高喂过饭。或许南开大学里确实有人自觉或被迫向红卫兵提供了线索，但为他们撑腰打气并为他们指点迷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见是“康老”，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红卫兵又问：“如何去查呀？”康生回答：“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说完，康生还当场给红卫兵写了一张条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条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

康生不仅为南开红卫兵指点迷津，而且还向他们发放了“抓叛徒”的“特别通行证”。至于具体地揪高仰云，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揪出薄一波等61人，最后揪出刘少奇这个“黑后台”，康生似乎不曾向南开红卫兵彻底点透。实际上，康生有自己的班子。早在1966年8月初，为了呼应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的出狱事件进行调查。“彭真专案组”领旨后，很快成立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约在1966年9月间，“三六专案组”已经查到《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报纸的影印件。

8月18日后，南开红卫兵立即杀向北京，杀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杨献珍。他们找不见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杨献珍。在“首战杨献珍”前夕，红卫兵曾集体发了毒誓：“杨献珍，你就是‘铁’老虎，我们也要敲掉你两颗牙！”

其实，此时的杨献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至多是只“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对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倾”之风将他从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继而又亲手导演了批判“合二为一”的“好戏”，彻底将他扫地出门。在哲学所，南开红卫兵一上来就将杨献珍围在屋子中间，像审犯人一般进行突击审问。他们单刀直入：“杨献珍！你和高仰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杨献珍知道来者不善，一口咬定说：和高只是一般认识，没有什么联系。此后，无论红卫兵怎么问，杨献珍或者说声“老糊涂了，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开口。红卫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语录并放出狠话：“杨献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五分钟后再来。”五分钟后，红卫兵果然杀气腾腾地来了。此时，年届古稀的杨献珍已是满头大汗，嘴

唇哆嗦，再也无力抵挡红卫兵的“革命攻势”，不得不承认他在1936年和高仰云一起蹲过敌人的监狱，还在狱中给高喂过饭。红卫兵顿时一阵狂喜，急不可耐地追问他们在狱中的情况。杨献珍说我据实交代吧，就把他们在狱中如何立场坚定如何英勇斗争直至出狱的故事说了一遍。红卫兵突然大喝一声：“杨献珍，收起你的鬼把戏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他们竟能对你这位立场坚定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大发善心？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出狱的吧！”

杨献珍心里十分明白，这段出狱历史容易让人误会，也特别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至于眼前的红卫兵，就更难以理解那段历史了。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想“交代”的。现在，“最后一刻”到了，他不得不“交代”了他和高仰云是如何奉了上级指示，通过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且不得不“供认”，同时发表“反共启事”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

#### ◇ “千辛万苦”摸清关键环节

从杨献珍身上打开“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缺口”后，南开红卫兵立即又杀向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要翻出那些“反共启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卫兵“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几口冷水，啃几口冷馒头”，奋战了三天三夜，终于从《华北日报》上找到了61人的“反共启事”。

可是，“反共启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刘澜涛化名“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复翻阅“反共启事”，红卫兵仍旧一头雾水。死材料不会说话，还得抓活的，他们很快总结成了两句话秘诀，叫做“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从故纸堆中出来，红卫兵又先后六次提审杨献珍。红卫兵自己也承认：“攻破杨贼是破获叛徒集团的关键”。他们还自豪地宣称：这是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教导的结果。根据“供出”的线索，红卫兵乘胜追击，“直捣”廖鲁言（农业部长），“怒斥”徐冰（统战部长），“激战”朱则民（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到1966年10月，红卫兵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这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叛党投敌”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伙叛徒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刘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传给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长），孔又传给狱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里灯火通明，红卫兵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红卫兵写道：“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请示报告”中，红卫兵向中央请示：（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请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还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几天后，红卫兵又给他们的校友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占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言下之意，大约是恳请周恩来看在南开校友的份上，为他们搞这个“惊天大案”助一臂之力。

红卫兵的“请示报告”名为“请示”，实则根本就不想“请示”什么。在那样的“革命气氛”下，他们也不必“请示”什么。红卫兵刚送交了请示报告，就在南开园里贴出了《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与此同时，他们拉出了许多个“抓叛徒战斗队”，杀向全国各地。据1967年10月他们自己的统计：“踏遍全国二十

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

红卫兵的一支战斗队杀向了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们的目标是一头白发的“白匪”刘澜涛。20多天过去了，仍旧没有抓到刘澜涛。红卫兵便将西北局办公楼团团围住，“果断地采取了静坐示威的革命行动”。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位眼尖的红卫兵认出了刘澜涛乘坐的小轿车。小车在前面跑，红卫兵在后面追，最后，“奇迹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一八小将，就凭着一双脚，追上了刘澜涛的小轿车，在深山中逮住了刘澜涛”。

还有一支战斗队，在白山黑水间跟踪追击。他们早就查出61人“叛徒集团”中的“罗霖祥”和“汪德光”“盘踞”在东北局。“罗霖祥”如今叫“赵林”，任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汪德光”真名叫“王鹤峰”，任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揪斗赵林，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出师不利，于是，战斗队就集中火力搞王鹤峰。不料王鹤峰听到了风声，走为上策，躲到了大连。战斗队日夜兼程赶往大连，将他当场“抓获”。面对红卫兵的审问，王鹤峰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汪德光”。这一次，红卫兵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好戏”。王鹤峰却有些急了，连夜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发电报，请求有关人员帮助转告各地的草岚子难友，如果红卫兵向他们打听他在狱中的名字，“务请绝对不要告诉”。红卫兵果然“神通广大”，电报落入了他们手中。王鹤峰发了电报，仍不放心，急忙赶回东北局，从家中翻出在草岚子与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飞机到了北京。红卫兵仍旧不动声色，坐了火车，尾随而至。在北京，王鹤峰的警惕性提高了，发现红卫兵在跟踪自己，他一面让随从与红卫兵周旋，一面搬了住处。自以为很安全了，他就满北京城找难友，“大搞攻守同盟”。他当然不能想到，“小将们暗暗跟着王鹤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家”。红卫兵简直比昔日搞过地下工作的王鹤峰还厉害，所以，事后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嘲笑王鹤峰：“大叛徒王鹤峰为小将领了路，做了向导，他还自鸣得意。”

#### ◇ 六十一人被定为“叛徒集团”并揪出“总后台”

全面出击的南开红卫兵也并非总是那么春风得意，上上下下都有人不买他们的账，或者索性跟他们对着干。南开的另一派红卫兵“卫东”，与“八一八”争着“抓叛徒”。他们也远征大西北，发誓要揪出刘澜涛。11月23日，南开“卫东”伙同当地红卫兵准备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刘澜涛。西北局电话请示中央，周恩来于24日回电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周恩来特地附信说明：刘澜涛等人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全国各地的抵制乃至反击就更多了。红卫兵曾自述他们所遭遇的“革命低潮”：“阶级敌人手忙脚乱，以垂死的疯狂加紧了对八一八小将的政治迫害”，“迎面而来的是围、追、堵、截、砸、打、抢、抄、抓”。但是，红卫兵很快迎来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967年1月9日，红卫兵又写就一份《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报告》，送交“中央并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历数“刘少奇叛徒集团”30多年来的“三反”罪行，列出了300名叛徒的地域分布表。最后，就“今后怎么搞”作出了战略部署。自此以后，南开红卫兵日益获得中央文革的青睐。中央文革多次说过：“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尤其是康生，“一月风暴”以后，不只一次公开支持南开红卫兵。他曾在中央组织部煽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自己也说：“在南京遇到困难时，康生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首长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南开红卫兵最得意之作，是所谓的“寒天风雪月，三审张闻天”。各地战斗队的一条条重要线索，汇聚到天寒地冻的北京城。又一个目标出现了，红卫兵发现自己正在逼近“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北京战斗队断然决定提审张闻天。1967年2月14日，红卫兵一审张闻天。他们一涌而上，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揭发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张闻天似乎并不把红卫兵放在眼里，“他傲慢地又吸烟，又喝水”。问得急了，就声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这很是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又质问张闻天：“（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你伙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难道就是你的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吗？”张闻天只好承认：“我就反了这一次。”红卫兵这才大声喝住了张闻天，单刀直入问：“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1936年，你就曾经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再三要他“放老实点”，他含糊其词：“也许刘少奇给我打过电报。”红卫兵步步进逼：“什么内容？”张闻天说：“我不能说。”红卫兵问：“为什么不能说？”张闻天答：“记不清了。”

张闻天显然采取了拖延战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说，以后的二审三审，他其实也在故意拖延。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被南开红卫兵审问的那段日子，张闻天“很为踌躇”。他既不愿不顾事实，将责任推卸给刘少奇，而使他蒙冤受害；也不愿尊重事实，明言此事毛泽东知晓，而领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事真相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张闻天只是含蓄地说，此事回忆的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档案后明示。接连去了两封信，都不见回音，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在向南开红卫兵的“交代材料”里，他写道：“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审完张闻天，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此材料由康生掌控的“彭真专案组”写成，而批示不过是更加提纲挈领。批示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别处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六十一人案”当事人及受牵连人员不断向中央申诉，要求平反。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六十一人案”平反。

□ 《百年潮》 2008年第2期

~~~~~

## 【回首文革】

1966年夏北大见闻（上）

• 李海文 •

### ◇ 聂元梓大字报命运的“戏剧性”变化

1966年，我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学习。这年夏天，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楼梓庄大队（北京工业大学的附近）搞社教。社教运动此时已进入尾声。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文章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突然间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何明”文章也指出《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这两篇文章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署名“高炬”的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而“何明”则是关锋的笔名。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即使我们尚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都知道,“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是够“振奋人心”的,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了,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而普通青年学生则兴奋不已,期待着非凡时代的到来。

5月25日,突然听到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甚至在大饭厅前有人动手,推推搡搡。很快听说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恩来,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聂元梓也害怕了,就向北大校长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让她写的。

知情的老师告诉我们,写大字报的人都是对学校有意见的社教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并不是主要人物,坚定的“左派”都下去搞“四清”了。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突然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都明白形势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组长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才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得早。但是,吴传启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一个原因,杨述1961年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职务,但此前已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另一个原因,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听到一些鼓动,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而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的名字,还联系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所以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

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问题公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也公开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很快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消息,公布了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在党内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附件《大事记》,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群众运动阶段。

◇ 张恩慈作报告: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

我们赶回学校，工作组已进校，但是人数很少，只有32个人。工作组马上召开了会议，凌晨零点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千人大会。我在大饭厅前看见有人（可能是工作组的同志）正在讲话，宣布工作组进校了。但是，他面前聚集的学生很少，只有几十个人。同学们在校园内不停地走动，互相打听消息，议论纷纷。那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是，那时学生还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遵守纪律，没有过分的举动。

很快，中央从全国各地、从军队中抽调200人增加工作组的力量，控制住局面。学校全部实现由工作组领导，一切以系、班为单位，按部就班进行。

6月9日，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教师孔繁的报告，主会场设在大饭厅。主持人特别介绍说，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俩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的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了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过的“穿针引线”的作用而自诩。这个报告我印象深刻。现在有人不承认这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

#### ◇ “六一八”事件：开了乱批、乱斗的恶例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斗校长的消息，并发表社论肯定这种做法。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为什么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和系里的负责干部集中开会，进行政治学习。北大教室很少，大家都在男生宿舍分组学习讨论。最大的宿舍是连在一起的38号楼、39号楼。38号楼住着哲学系、历史系等系的男生。这两个系都是文科的大系。政治系是小系，男生住在39号楼的一层。大约10时左右课间休息，突然听说在东边38号楼设了“斗鬼台”（当时称有问题的人为“牛鬼蛇神”）。我过去一看，有一二百个人在伸着脖子张望，楼外有一段楼梯，进楼处有一个平台上有一米多高的墙，外系低年级的男生正在里面斗老师。他们拿厕所的纸篓当做高帽子扣在老师头上，从头上往下泼墨汁。这哪是革命，完全是恶作剧！我不忍看下去，抽身出来。当然也有同病相怜的原因吧，我是学生干部，我的父亲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此前已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

后来工作组组织学习时告诉大家，不仅是38号楼斗老师，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还斗了40多位正和学生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团干部和两个学生干部，其中就有西语系的学生吴然。吴然是烈士子弟，系团支部书记。他的父母牺牲后，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抚养成人。此时吴子牧已被打倒，他马上也受到株连。

工作组说：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违反党的政策，这种做法已被坏人利用。经过一天的工作，基本查清了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人物的情况。有几个学生有流氓习气，有一个工人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后因贪污判过徒刑。他们或给校外打电话，或寻找要斗的人，集中到一起斗。工作组宣布：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并组织全体学生学习、讨论三天。

其实，外边的坏人混进来并不奇怪，北大的校门是敞开的，进出自由，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哪儿有事，他们都会参与。

“四清”时，各级领导不断教育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教育我们要分清敌我，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那时定“漏网”的地主富农，都有详细的条文，严格的定量规定，反复衡量，哪一条不符合也定不上。就是对地主、富农也不能罚站，更不能乱斗。所以搞“四清”回来的同学都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6月18日那天，38号楼的乱斗就是五年级的学生出来制止的：“说理斗争不要打人。”工作组领导张承先等和各系工作组同志闻讯后也赶赴现场制止。11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在那种气氛下，工作组将问题估计过高，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19日、20日、21日一连三日组织全体师生讨论、对照、检讨。并提出准备斗陆平，但是一直也没有付诸行动。从《北京大学纪事》得知，各系分别开会斗了17个干部。当时北大共有18个系，我所在的国政系没有开批斗大会。工作组搞人人过关有些过火，但是工作组的干部政策是对的，是保护广大干部的；实际上也保护了青年学生，避免他们因不懂政策、不谙世事而上当受骗，跟上坏人犯错误。

#### ◇ 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同妈妈的一席话

1966年7月10日，我爸爸李琪突然含冤去世。妈妈悲痛欲绝，不能自己。哥哥远在哈尔滨上学，因工作组要求对爸爸的死严格保密，他对此一无所知。三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最大的妹妹上高一，最小的妹妹才上小学五年级。全家人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到家，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妈妈得知工作组准了我的假，又没有限定回校的时间后，感到很欣慰。

回到家，我昼夜陪伴妈妈。她同我讲了许多话。她因是北京农林局副局长，也在北京饭店开会。她天天去看爸爸。后来，她成为小组批判的重点后也是如此。我从小跟着父母长大，从来没有见他们吵嘴，夫妻恩爱，家庭和睦。6月底，会议告一段落，暂时结束，刘仁、郑天翔、爸爸、范瑾几个“问题严重”的人留下继续检查，各局、区、县的负责人要回单位。那时，有的地方已开始像1947年斗地主一样斗干部。李雪峰对我妈妈说：你愿意回去就回去，不愿意回去就住在这儿，什么时候回去都行。妈妈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次的运动一样，几个月就结束。再说，她胸怀坦荡，心直口快，一心只为工作。她认为，工作中的问题，没有讲不清的事情，她愿意回到群众中接受批评，尽早解决问题。她回去就被扣，爸爸三次给她打电话，也不准接。10天，仅仅过了10天，爸爸就没有了。妈妈非常后悔，一再对我说：如果听了李雪峰的话，留在北京饭店，你爸爸就不会走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整理李雪峰回忆录时，将他在北京饭店讲的这几句话写进了回忆录中。其实，年代久远，他每天讲许多话，早已忘记了这件事。

11日，发现爸爸出事，抢救一天，没有抢救过来。第二天，华北局工作组通知妈妈先到友谊医院向爸爸遗体告别，然后到北京饭店收拾东西。他们怕妈妈出问题，派医生一直跟着。晚上，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找妈妈谈话。他说：本来他（指爸爸）的问题已快完了。他的问题交代到4月中旬，交代到我们进驻市委即可告一段落，他却等不及了。他想不通可以来找我。我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我们为他的死难过。我和雪峰、吴德同志商量的，你在家休息，不要着急回机关。他含着眼泪和妈妈谈话。他不放心，怕妈妈也想不开，一直不让妈妈走。直到妈妈说：“从大局出发，是为了革命工作，从家庭说，为了我的5个子女，我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就是要你这句话，我相信你能挺过来。”

池伯伯是爸爸在解放战争时一起在晋中工作的老领导、老战友，但是他的谈话是代表组织

的，反映了华北局、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的态度。他说这些话时，万万没有想到工作组“执行的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这些话成为“包庇走资派”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运动一直持续了10年，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叶剑英领导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妈妈毕竟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共产党员，过了几日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我劝她：“妈妈，你16岁参加革命，近30年党龄，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革命，现在何况你们还有错误，更应该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21日，妈妈对我说：“海文，你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再在家休息几天，就回机关。”她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此前的历次运动一样，很快会结束。再说，她参加革命后一直做群众工作，和群众在一起，她常说没有群众的掩护、帮助，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她从不怕群众，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尽早解决问题。那时，我们想得都太天真了。

◇ 聂元梓一语惊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1966年7月21日当晚，我回到学校。“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学校形势大变。7月12日，地球物理系贴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评工作组，石破天惊。16日、17日、18日张承先三次作检查，认为将“六一八”事件整个估计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因为参与的大多数人是好人。顿时，大家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但还是善意批评。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讲：“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封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成为“通天人物”，她的话当然反映中央的最新动向。大家的认识后来得到验证，聂元梓是从康生办公室得到消息的。

聂元梓的话一出口，全校震动，当晚在大饭厅通宵辩论。当时，华北局第一书记、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在历史系三年级学习。20日，她和同班同学王海治等贴出大字报，针锋相对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贺龙的女儿贺小明、吕东的女儿吕宏等六个干部子弟贴出大字报保工作组，向工作组提出建议性的意见。这些高干子弟的态度当然反映他们父辈的看法，不少人响应。这些保工作组的大字报稿，后因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批评，很快刘少奇、邓小平承认错误，作者不再坚持原有的看法，社会抛弃保工作组的观点。由于各种版本的大字报选都没有收录，他们自己也没有保存，现已找不到大字报稿全文。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文革八面威风，炙手可热。群众听任他们的摆布，狂热之极，缺乏独立思考。社会舆论是那么统一、一边倒，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民主”、“保护少数派”都有特定的含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句空话。

我回到学校时，学校气氛异常热烈。班里男生告诉我这几天学校的变化，领我到39号楼门口看他们刚贴出来的大字报，邀我签名。我们系的同学没有参与“六一八”事件，事后三天的对照检查，大家谈认识、感想，没有整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不大。

大部分同学认为应该批评工作组，少部分认为“批评”这种提法是保皇派，应该改组工作组，罢免张承先的职务，让聂元梓参加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是延安，还是西安？是批评，还是打倒？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还没有人要提出赶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是7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来的。

◇ 江青在北大说：“谁不革命就走开。”

1966年7月22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了，校园里异常安静。我因为头一天晚上刚返回学校，没有去参加大会，一个人到大饭厅前的小树林里踌躇而行。将近中午，突然有几个人从北边走过来，边走边兴奋地议论着刚才他们在燕南园听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的讲话。江青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跟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派这面。革命派跟我们一块，谁不革命就离开。”几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在北大燕南园召开座谈会，结束后出来碰上的。”有的说：“就在燕南园，向北有一个大下坡，江青站在高坡上说的。当时只有十几名同学。”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到燕南园召开过座谈会，19日就来过一次了。”

我听后很惊异：中央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万人大会，江青、陈伯达没有出席会议？他们到北大来，这么重视北大，出什么事了？我明知他们已走了，还是赶到江青讲演的地方观看。燕南园是北大的园中园，有一人多高的围墙，绿树丛中有一座座别墅式的房屋，是教授、领导住的地方，我们平时很少进去。燕南园只有一个北向的通道。路窄，汽车进不去，只能停在外面。燕南园地势高，比北边第二体育馆、球场高出一两米。我们女同学经常在那里上体育课，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后来我看了《北京大学纪事》，知道23日江青、陈伯达再次到燕南园来召开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是25日、26日万人大会的前兆。

江青公开指责工作组“不革命”。后来，她多次重复“革命派跟我们一块，谁不革命就离开”，很快被红卫兵改为：“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加上了“国骂”——“他妈的”，成为“文革”中的名言，造反派的“口头禅”，动不动就让人家“滚蛋”。

工作组已是四面楚歌，处境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池必卿知道妈妈想回机关，便亲自来电话劝阻：“你休息好了再回去，一定不要着急。”他也可能预感到形势剧变，将来妈妈再也不会有在家休息的机会了。

7月下旬，妈妈回到机关。华北局驻北京市委工作组很快知道了，派华北局农村政治部主任范克让到机关来看望妈妈。他来了后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不是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嘛！”妈妈回答：“我想早点检讨完了。”范克让说：“李琪同志认识的人这么多，怎么不找人谈谈？”妈妈问：“你怎么叫他同志？”范克让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还没有作结论，怎么不能叫同志。”临走时，他说：“我再找工作组谈谈。”并一再叮嘱：“你有事一定要给我、给老池打电话。”华北局干部的这些话无法改变大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温暖着妈妈的心。妈妈是一个永远记着别人的好处的人。后来，范克让生病后，她坚持到医院看望。她经常叨念、看望池必卿。她一直支持我整理李雪峰回忆录，出席李雪峰夫人翟英的追悼会。吴德逝世，她让我陪她一同到吴德家里吊唁，出席吴德的追悼会。

谁也没有想到，范克让到机关看望妈妈后，过了几天风云突变，中央宣布工作组犯了错误，宣布撤销工作组。北京市委、华北局自身难保。从此，“文化大革命”从文教系统，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发展到各省、市、自治区，发展到各级党政机关，天下大乱，一发不可收拾。

#### ◇ 中央文革在北大召开“七二五”大会

1966年7月25日、26日，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同学们既新奇又兴奋，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要干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人人都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大会，参加会的不仅有北大全体师生员工，还有闻讯赶来的外校师生，将东操场站得满满的，远远超过1万人。我们系得到消息早，坐在前面，将台上的表演看得一清二楚。会场上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高潮迭起，宛若电影《列宁在十月》演讲场面的再现。会场气氛异常热烈、紧张，扣人心弦，至今历历在目。

召开大会的目的，江青、康生、陈伯达说是要听取不同意见，让同学们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但是，辩论徒有虚名，舆论一边倒。7月25日来的人很多，近百米长的主席台上挤得满满的，三四排座位都坐不下，不少人站着。台下的人不断地递条子，台上的人走来走去，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酷热的夏天，个个是大汗淋漓，主席台上不少人都扇着纸扇。台下的群众反倒比较安静，个个仰着头，看着台上的一举一动。

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发表讲话。

江青第一个讲话，先声夺人，亮出夫人身份：“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不可一世，咄咄逼人。江青没有别的才干，只能仗势欺人。“代表毛主席”是她惯用的手法，走到哪儿说到哪儿。一直到1974年7月毛泽东才在政治局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这时“文革”已进行8年了。

然后，康生讲话：“真理通过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六一八’。有人说所谓‘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

康生的话倾向性十分明显。其实陈伯达来北大开座谈会早就表明了态度：“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但是我不知情，第一次听康生这样讲，大吃一惊。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康生接着说：“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我更为惊讶：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已被改组批判，李雪峰领导的新市委刚刚成立，怎么敢自作主张？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北京，那是刘少奇、邓小平背着毛主席派的？不会吧，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向毛主席请示？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第一张大字报，晚上北大就派来了工作组。就是事情紧急，事先不请示，事后还不汇报？其实6月1日陈伯达就带领工作组到了人民日报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派出的工作组，只是我们当时还不清楚。

康生继续说：“工作组怎么样？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文化大革命怎样做？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

康生主张斗陆平、彭佩云这些当权派，斗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学术权威。他完全同意“六一八”事件那种野蛮的斗争方式，不点名地批评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方式，将矛头对准6月1日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讲话的态度明确而富有煽动性。

在这种情况下，被允许上来发言的人多数都抨击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控诉学校的迫害。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一个是法律系一年级学生牛××。他自称是干部子弟，受到学校的迫害。我相信他是干部子弟，但是，我不相信他会受到学校迫害。江青在讲话中曾提到他的发言，从此他成为“左派”，名噪一时。那时，一个发言、一篇文章就能成为响当当的“左派”。过几天不知何事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很多，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

另一个是北大附中“红旗”的头头彭××。他上台争取到发言的机会，口若悬河，言词激烈地批判工作组，受到江青表扬。

台下纷纷写条子，向主席台上递。江青离开时，用报纸包着这些条子，足足有一大包。第二天，她在大会上宣布：昨天同学们的每张纸条、每个意见，毛主席都看了。

25日晚，突然下起雨来，会议被迫中断。

（未完待续）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1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